

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

科学技术史

科学哲学

科技与社会

科技中国

科技政策

科学人物

专题

读书评论

当前位置: 首页> 科学文化

[【小中大】](#) | [【打印】](#) | [【关闭窗口】](#) |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3期

不妥协的因果解释*

——论维果茨基的情绪理论

原琦 宋斌

(南开大学哲学系, 天津 300071)

摘要: 为了更加准确地说明人类的情绪机制,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历史回顾以及现代学者实验研究成果的借鉴, 维果茨基创造性地将情绪现象置入由理智、意志等多重因素所组成的综合心理结构中, 并坚持使用一元论的因果原则来对这一结构的内在机制进行说明。在这种全新的科学建构活动中, 以“言语思维”为主导的人类行为成为了驱动情绪机制的终极原因, 由此, 在维果茨基范围广泛的心理学实践中便体现出一以贯之的理论特质。

关键词: 一元论 因果原则 自然主义 自体刺激 言语思维

(中图分类号) N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63 (2009) 03-000 -

以强调人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的言语思维理论为代表的维果茨基心理学, 在其发展的后期, 为了更加深入地说明人类的思维机制, 越来越重视对于情绪现象的研究。维果茨基说: “思维尚不是最高级……思维本身并不是从其他思维中产生的, 而是来自我们意识的动机领域……思维的背后是情感和意志倾向, 只有它们才能解答思维分析中的最后一个为什么。” (1), p. 332) [①]

正如同其在言语思维理论中始终坚持使用唯物主义一元论来构建自己的解释系统, 在对情绪现象的反思中, 维果茨基理论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一元论倾向。这种倾向既不同于将情绪与理智做相互割裂的二元式说明的机械论生理学, 也不同于仅仅对人类复杂的情绪现象进行零散的个别式说明的普通心理学。与此相反, 维果茨基坚持使用“不妥协的因果解释” [②] 来对包含理智、意志、情绪等多重因素的心理现象做整体的结构式说明。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维果茨基为克服当代心理学二元论缺陷所做出的努力 [③], 也同样可以在这种不妥协的科学建构尝试中获得使得心理学科学化的重要启示。

一、历史的回顾

维果茨基对于情绪现象的研究是从对情绪理论的历史回顾开始的。在这种回顾中, 首先进入其视野的是以强调情绪的生物学起源为特点的自然主义的机械论生理学, 在维果茨基看来, “有关情绪的学说与心理学其它领域比起来非常特异, 这一篇章主要被纯自然主义独占。” (5), p. 416) 而此类学说的最大特点便是学者们始终把情绪与理智看做是相互对立的, 并且, 他们进一步地做出了情绪—动物、理智—人类的二元式划分, 其对情绪现象的生物学说明并不能应用于理智以及其他人类特有的思维现象中, 由此导致了此类学说明显的二元论特质。

在此种自然主义情绪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达尔文是旗帜鲜明地强调人类情绪的生物学起源的第一人。达尔文在《人类表情活动的起源》一书中, 将人类的情绪和在动物世界观察到的激动的、本能的反应相联系, 他的进化思想认为, 人类的感觉、激情, 其自私、贪婪的欲望以及担心自己肉体安危的情绪均具有动物的起源。

(5), p. 417) 达尔文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实证论者斯宾塞等人发展成为情绪残存理论。他们认为, 情绪是人类心理的独立领域, 它只能被追溯的理解: 恐惧及其所伴随的表情活动是动物在做出逃跑与防御等反应时的残

存，而愤怒则同样是动物祖先从事攻击行为的残留；以此类推，人类情绪的发展曲线是向下的，即未来人是没有情绪的，在他们那里，人类理智的高度发展会使得人们直接根据刺激做出对自身有意义的反应，那些仅在远古时期对人类生存具有意义的反应的残存环节——情绪便逐渐消逝了。（（5），p. 417）换言之，当人类心理向前发展的时候，情绪则倒退了。

显然，对人类情绪做生物学说明的这一初步尝试因其激进与片面性而包含有巨大的困难。以此理论来看，情绪是人类动物祖先的机体反应的残存环节，随着人类的进步，这一环节最终将成为无用的。然而这一理论却恰恰不能够说明，为什么人不需要情绪，而动物生存的残余却持续存在着呢？况且，在维果茨基看来，情绪即使从追溯的观点看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情绪之中凝聚了人类个体意含丰富的历史经历以及内部体验。

（（5），p. 419）如果我们仍坚持以上观点，情绪反而成为了人类整体心理生活中的死域，对情绪特殊性的说明将变得不可能。

沿袭达尔文所开创的情绪的生物学起源思想，詹姆士·兰格理论解决了以上所提到的内在于此类思路中的难题。詹姆士·兰格学说并不认为情绪是动物本能反应的残余，正相反，它在人类的机体反应中找到了情绪生命力的源泉。这一理论将此前所认识到的情绪反应的次序颠倒了过来。先前人们总认为，情绪反应的次序是：首先，对内外事件的感受引起情绪（如遇到危险）；之后，体验这一情绪（恐惧的感觉）；最终，产生相应的机体的表现（心悸、变苍白、颤抖、喉咙发干——所有恐惧所伴有的症状）。而詹姆士·兰格学说则认为，在对事件的觉知后直接出现的是条件反射所引起的机体变化；这些反射式的机体变化进而再次被我们感受到，而对机体反应的这种觉知就是情绪的基础。通常认为，我们哭是因为伤心，颤抖是因为受惊，打击是因为激怒。实际上，我们伤心是因为哭泣，受惊是因为颤抖，激怒则是因为打击。（（5），pp. 418-419）这样，情绪不再被看做是由刺激到反应的无用的中间环节，而情绪的如此丰富的生命力的根源恰恰正是机体反应本身，

由此，作为有关情绪的生理机制的第一个完整学说的詹姆士兰格理论，以更加彻底的机械论立场赋予了情绪反应以明显的生物学基础。这一理论指出了情绪与机体生理变化的直接联系，强调了外周生理活动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后人称这一理论为情绪的外周理论。詹姆士说：“人类思维的器官是脑子，情绪的器官则是植物性的内部器官。”（（5），p. 421）而这就意味着，情绪机制的“外周化”使得情绪脱离了意识，它成为了脱离人类所有其它的心理生活的可以被单独研究的对象。

维果茨基注意到，詹姆士·兰格理论是机械论世界观在情绪研究领域中最完整也最鲜明的应用。（（6），p. 93）这种旨在消除情绪研究中“不明确力量的虚幻本质（призрачных сущностей неясно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ил）”（（6），p. 93）的理论承袭了笛卡尔、斯宾诺莎将情绪看做是“生物好处的装置（биологически полезное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е）”（（5），p. 432）的情绪生物效用学说[④]，虽然使得情绪研究整体上趋向学理化与科学化，但是，其将情绪与人类其他心理活动相分离的做法却在之后的研究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直接针对这一问题的发难者是坎农—巴德学说。这一学说认为，詹姆士—兰格理论看到了情绪与机体变化的直接关联，强调了植物性神经系统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但是，它却片面强调了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作用，忽视了中枢神经系统对情绪现象的控制和调节。这种新的研究指出，实际上，情绪的中枢并不在外周神经系统，而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丘脑。在情绪产生的过程中，由外界刺激所引起的神经冲动传至丘脑，再由丘脑同时向大脑和植物性神经系统发出神经信号，从而使得人们在大脑中产生情绪的主观体验的同时再由植物性神经系统产生与之相伴随的机体的生理变化。（（5），p. 427）在坎农的研究中，其要点是使情绪活动中心由周边移向中心，将情绪的产生和变化同大脑的复杂运作联系起来。这样，这一理论就为对于情绪及其与人类心理生活中其他方面（如理智、意志、想象力）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自此，一系列真正符合“心理学”意义上的，旨在将“情绪”视为人类心理整体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研究便由此展开。

弗洛伊德便是在这一领域中进一步研究的主线。他反对片面重视与情绪相关的生理构成的研究方法，他指责詹姆斯—兰格学说的老套的生理心理学倾向，认为这种研究只能研究情绪表现的器官运作，但是其底层的心理内核却丝毫没有触及。（（5），p. 428）

与此相对应，弗洛伊德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对于传统的情绪生物效用学说的质疑。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旧的论点（情绪是生物好处的装置）正确的话，那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情绪是造成人类行为深度长时扰乱的根源。为什么激动时，我们不能正常的思考；为什么处于扰乱的情绪时，我们不能正常、有计划地行动；为什么在强烈情感激动时，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5），p. 432）确实，我们发现，根据简单的生物学的和机械论的自然学说所解释的人类情绪几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情绪研究所要面对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便是：对于这些生物的装置今人和古人同样必需，就像对食物和水的需要一样，但是这些情绪本身却又是扰乱人类意识，进而使之出现近乎无限多样的差异化与复杂化的动力。

据此，弗洛伊德提出了情绪生活的特殊的动力学。这种学说认为情绪在功能意义上不仅和生物本能相关，而且它也是人类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人类对生活的总的观点及其性格构成，一方面，反映在情绪生活的特定领域里，另一方面，它们又被情绪体验所确定。（（5），p. 429）由此，情绪学说便成为了人类性格学说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如果在先前的生理学中，情绪被看做是次要的以及正在消逝的，那么现在情绪就和人的性格形成密切相关了。

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是西方当代心理学对于传统机械论生理学的强烈反叛。这种反叛将情绪从生物学领域拉回到真正的人类心理领域，注意到了情绪现象与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之间的关联。弗洛伊德此后的情绪研究便长时期地遵循着这种思路。

与情绪理论的这一发展趋势相呼应，克拉帕雷德（К л а п а р е д）以更加系统化的方式提出了对于传统情绪理论的质疑：如果情绪的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其生物功效，那如何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活动随着人类在其历史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次变化，不仅导致了心理生活的扰乱，而且还导致人类心理生活内容的无限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甚至在艺术中也表现出来)呢?为什么人类的理性认知显露出强烈的情感体验,而儿童和人类命运中的每一次重要转折都如此清晰地具有情感因素呢? (5), p. 432)

正如其他现代心理学研究者们所贯常采取的方法,克拉帕雷德尝试着通过实验来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对兔子生活状况的观察,克拉帕雷德发现,兔子受惊后害怕并且逃跑,但是使其获救的并不是害怕,相反,害怕常常扰乱了它的逃跑并危害到它。因此,克拉帕雷德设想,在如此即起的情绪反应中存在着另一过程——“感觉”,它们对于动物的行为来说是灾难。当动物害怕并且逃跑,这是一种有利的情绪,而当动物如此害怕以至于不能逃跑时,便出现了对其有害的“感觉”。人的行为也是同样,虽从外部看“情绪”与“感觉”相似,但在其内部却被明显地体验与区分。(5), p. 432-433) 维果茨基注意到,克拉帕雷德工作的意义正是在于他成功地用实验划分了情绪和感觉概念,进而确定地指出了以前实验研究者们所未加重视的情绪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5), p. 433)

二、批判的反思

从达尔文到弗洛伊德,维果茨基通过对情绪理论的历史回顾,发现其中存在着个性显明的两条线索:一方面,在自然主义的生理研究中,将情感生活的中心由脑外引入脑内,由外周移向内在;而另一方面,在心理学中,将情绪从人类心理的偏僻角落中移出,并使它进入到与所有其它思维过程紧密相连的整体心理生活中。

(5), p. 434) 而这两条线索实际上殊路同归,那就是,两者同时注意到情绪作为整体人类心理生活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特殊地位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情绪生活极其丰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而无法对其进行孤立的片面的研究。

然而,由于自然主义坚持使用生物学方法说明情绪的生理机制,使得他们在面对人类高级的复杂情绪时无法继续坚持使用科学的因果原则来构建其学说体系,这样,他们的理论就明显陷入了“二元论”的窠臼。例如,此流派中影响最大的詹姆斯·兰格理论,它在坚持用生物学原则说明情绪的生理机制的同时,却区分了高级和低级的情绪,它认为低级情绪是从动物那里继承的一系列机体反应的伴随物,这些情绪因其仅具有表征机体器官活动的简单功能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改变;而高级的、精细的情绪,如宗教情绪、爱情、美学情感等,是理智领域的情绪,它们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被完善,它们是人类所独有的情感。(5), p. 420) 维果茨基发现,依照这种理论,如果说低级情绪可以用生物学的因果原则来加以说明,那么对于人类高级情感的起源就只能用“唯灵论”(“спиритуализм”(5), p. 422) 来解释了。也就是说,此种理论的提出本来是为了证明情绪的动物起源,但它最后却论定“人类从动物那带来的东西”和“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的东西”之间完全没有关联。正如维果茨基所批判地指出的:“不必说,詹姆斯·兰格的理论比之前的理论更坚固,它关闭了有关情绪发展问题的大门,进而完全排除了解决‘人类情绪起源’问题的可能性。”(5), p. 421)

而詹姆斯·兰格之后的理论,无论是自然主义学派还是心理学派,虽将情绪和大脑内部的中枢神经系统联系了起来,并进而认识到情绪发展和人类心理生活的其它方面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但是由于新的因果说明原则的缺乏,这一作为整体的人类心理结构的内在运作机制并没有被清晰而系统地说明。在这个意义上,维果茨基情绪理论的全部宗旨便在于寻求一种新的不同于一般生物学的因果原则来对包含情绪生活在内的整个人类心理机制进行统一的说明,即“不妥协的因果解释”。

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情绪与其他人类心理活动之间的关联呢?它们之间存不存在一种可被某一统一的因果原则来说明的内在结构呢?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维果茨基从心理病理学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启发。

这种研究是狭义上的心理病理学,其中包括了精神分裂症的病理学。布洛伊勒(Э. Блейлер)的工作就属于这种,他指出,由于病理的变化可以观察到情绪生活的相应改变。例如,当病人神经受伤或病变、或大脑受损,他们每几分钟就会出现强迫式的大笑或微笑;但这一状况却并不引起快乐的情绪,与此相反,此时此刻,病人们被强迫式地挤眉弄眼,他们的内心中反而经受着与其外观表现截然相反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情绪本身仍然保留着,但它们在人类内心生活中的正常位置却改变了。由于情绪在其内心生活中失去了早先的结构位置,人们表现出知觉扰乱的图景,结果,在病人的心理生活中出现了情绪与思维之间完全特殊的系统。(5), p. 435) 而维果茨基认为,早先研究者们所注意到的“自我中心思维”就是这种新心理系统的鲜明例子。可以说,这种思维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在其中理智与情绪因素本身并未受到伤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病理变化。(5), p. 435) 而这就启发维果茨基以一种全新的结构的观点来研究情绪与理智之间的动力机制。

一般认为,当思维不是朝向所面临的具体任务,而是具有情绪趋向时,即当思维服从于感情逻辑时,这种思维便属于自我中心思维。然而,在维果茨基看来,和自我中心思维相区别的“现实思维”并没有失去情绪因素。有时候,现实思维会带来比自我中心思维更强烈的情感。例如,带着鼓励和兴趣去寻找问题答案的研究者在思维过程中所经受的情绪体验,并不少于而是多于沉醉于自我中心思维的精神分裂者。(5), p. 435-436) 如果观察情绪参与现实思维的过程,那我们将看到现实思维和自我中心思维相比,同样可以具有至高的情绪性,两者间并不因为是否具有情绪性而相互区别。维果茨基认为,既然如此,正如在心理病理学研究所发现的情绪与思维间关系的特殊系统一样,在这里也同样涉及到对情绪和其他思维进程进行变换组合的内在机制。而自我中心思维与现实思维的准确区别则应当在于,虽然在两者中我们都具有理智和情感过程的某种综合,但是在现实思维中,情绪过程是被动的、受控的;而在自我中心思维中,情绪是主动的,理性过程则变成被动的了。(5), p. 436)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理智的参与,而使得情绪在人类内心生活的结构中失去了早先的位置。而正是这种结构位置的改变使得人类在情绪生活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那么,理智究竟是怎样参与到情绪生活中来的呢?情绪所从属的人类的整体心理结构,又是以怎样的机制来运作的呢?维果茨基发现,理智与情绪,作为人类整体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其相互关系的种种变化与结构

中的另一重要因素——“意志”紧密相连的，因为何种心理因素占主动，实际上就是人类意志自我规定其行为的表现，因此，对“意志”活动的探讨，将找到最终解释人类情绪机制的钥匙。

三、症结：言语思维

维果茨基对于“意志”的研究同样是从相关理论的历史回顾开始的。维果茨基注意到，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将意志化约为联想和智力的“被动路线”，即试图在意志之外解释意志并由此将意志还原为其他心理活动的尝试；也曾经存在过将意志看做是具有不可化约的基础心理现象的唯意志论，维果茨基将这种思路称为“自主理论”（автономная теория）；并且，也曾经产生过处于被动理论和自主理论的中间环节的“激情理论”，这种理论在激情身上找到了意志活动的最初原型，它认为在人所被动体会的情绪身上同时体现着作为人类积极主动的行为之动力的意志性，于是，情绪现象由此被还原为了激情。

（（5），pp. 454-458）

然而，这些历史上曾经提出过的意志理论却几乎都被此后重视实验研究的现代研究者们一个个地抛弃了。首先，考夫卡（К. Коффа）实验地划分了智力和意志活动，认为智力活动本身还不是意志活动；而勒温（К. Левин）则用同样的方法发现，一系列在心理学中总是被当作典型的意志活动的激情状态，实际上并不表现为确实的意志活动的特性，而仅仅是有密切联系，所以，将意志还原为激情的中间路线并不准确。

（（5），p. 461）而按照维果茨基的一元论与结构论的观点，企图将意志还原为任何非意志现象的理论都未曾注意到包括意志在内的整体人类心理生活的结构特点，而将意志认为是具有第一性的不可还原的基础心理过程的唯意志论因其拒绝进行进一步的因果解释而当然不能够被科学心理学所接受。所以，经过这样的回顾和反思，沿着对人类心理结构进行整体因果说明的思路，维果茨基最终在勒温的工作中得到了启发。

勒温通过一系列有关行为者“有意义行为”之诞生过程的实验查明了意志活动的结构。他指出，在原始形态上意志行为有着非常特殊的表现。这种表现可以综合地概括为：人们会借助某种特殊机制在意识外部找到支撑点，并进而通过它确定自身的行为。例如，在某一实验中，研究者们给予了被试者一系列无意义的任务，并长久地不转向被试者，而选择从另一个房间去观察他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在这个过程中里，起初，被试者们通常会等待10-20分钟，但当他们发现任务指令的无意义并停止领会他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长时间地处于不稳定、手忙脚乱和犹豫的状态。然而，接下去发生的现象却是，几乎所有的成人被试者都会实施不同的行为来使得自己摆脱这种“无意义”状态，这些行为的总的特点便是：在外部寻找行为的支撑点。典型的例子就是，被试者会根据表的指针来确定自己的行为：他会看一下表，对自己说：“当指针垂直时，我就走”。而当这一新的指令确立之时，他就会根据外部信号的指引最终离开实验室，完成自己的行为。（（5），p. 463）维果茨基认识到，由此可见，在执行无意义任务的过程中，被试者们出现了理解的倾向，他们会借助某一特殊的外部信号在本希望有意义但是却无意义的行为中建立新的刺激与反应机制，从而改变自己的心理预期，使得自己的行为重新具有意义。（（5），p. 463）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有意义的行为”之诞生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具有指称功能的外部信号的刺激。

而维果茨基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点认识到了意识活动的本质：“意志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行为的随意性，即人们采取这个或那个决定的自由，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意志活动区别于非意志活动的外部结构的多样性。”

（（5），p. 457）而使得具有如此特质的意志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本因素，便是人借助信号对自身进行刺激。由此，他将新的因素——语言，引入对意志活动的分析中并由此对其赋予了十分重大的意义，维果茨基认识到，意志活动的总体进程是：当人们说话，完全听从并完成自己的指示时，人们会通过从外部对自己的提议而使思维改变方向，换言之，人们的心理会通过建立辅助结构来改变先前的结构，而仅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才具有了意志性。（（5），pp. 464-465）

也就是说，意志活动既不是智力活动也不是激情活动，而是基于中介（语言）所进行的特殊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可以改变原有的心理结构，如情绪的心理结构，使得情绪在心理活动中的位置发生改变。由此我们也便可以进一步地说明历史上情绪理论所未加以说明的人类情绪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问题。例如，以情绪与理智的相互关系而言，外部语言的介入可以使得人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全然不同的意义关联，而这种意义关联又会直接作用于我们的心理结构，使得我们的心理结构发生以情绪为主导（自我中心思维）向以理智为主导（现实思维）的转变，由此看来，情绪与理智并不相互吞并，但却会由于以语言为媒介的意志活动的主导而使得两者的关系发生种种特殊的变化。

至此，维果茨基对于情绪现象的反思，已经同他有关“言语思维”的著名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理解言语思维甚至成为了说明情绪现象的终极手段。在这里，我们要尤其重视维果茨基所使用的“自体刺激”的概念。维果茨基说，“意志行为开始于当人们借助符号刺激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刻……研究符号系统的机制可以让我们明白，人是怎样形成并转向‘任意意向’的”。（（8），p. 50）可见，对意志行为之产生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人类可以通过符号工具对自身施加刺激，即“自体刺激”。早在《人类高级心理机能》一书中，维果茨基便在对人类高级心理机能的起源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古老的人为刺激的形式，如：求签占卦、结绳记事、用手指计算等。在这些人为刺激的方式中，“记号”被当做保存记忆以及自体刺激的工具，人们正是通过对以“记号”为工具的刺激的反应来决定着自己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词语”因其所具有的独特属性而被维果茨基认为是对于人类行为过程最为重要的信号刺激物[⑤]。维果茨基指出，人们的相互交往使得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和发展了极其复杂的心理联系系统以调节自身的行为，而创建这些心理联系的手段便是以“词语”为主要成分的记号。[⑥]也就是说，以语言为中介，“社会的声音成为了内在的声音，或是思维的声音”。（（11），p. 27）而语言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因为词语是一种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特殊意义关联的承载者，人们只有运用这一工具并进而将它同自身心理活动相结合，才能够对客观世界进行运算、思考，从而形成特殊的“言语思维”[⑦]；由此，人们也才可以借助这些特殊的言语指称系统，通过从外部对自己的提议而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向。正如维果茨基所认为的，心理符号体系能改变活动过程中人们的心理进程和心理功能结构。（（13），pp. 52-88）于是，当人们掌握了言语这一进行自体刺激的符号工具时，这种“自体刺激”便可以介入原有的心理结构，进而形成新的心理系统。[⑧]而情绪的心理结构，及其与理智、想象、意志等人

类其他心理现象之间的关联，也正是通过这一机制被持久地维系与变革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维果茨基通过对于“言语思维”机制的探讨，开启了一元论地解释包含情绪、意志、理智等多重因素在内的综合心理进程的道路，但是由于其英年早逝，这种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地细致化。在依靠言语符号的“自体刺激”而对情绪机制的具体改造方面，他并没有留下更多的启示。当然，我们显然已经可以看到他在理论的回顾与反思过程中是如何坚持使用“不妥协的因果解释”来对人类的情绪现象进行一贯之的“科学说明”的。在维果茨基看来，情绪的生物学关联当然存在，但是这种关联却是在以“言语思维”为特质的“情绪—意志—理智”综合心理格局中发生和运作的。而未来的心理学要构建完整的情绪理论，维果茨基的这一道路不失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启发。

(参 考 文 献)

- (1) 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 *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 (M). Москва: Лабиринт, 1999. 332.
- (2) М. Г. Ярошевский. *Послесловие* (M).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ти т. Т. 6. Москва: Педагогика, 1984. 346.
- (3) 麻彦坤. 维果茨基对心理学的方法论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3 (4). 140.
- (4) Leontiev A.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edological works of L. S. Vygotsky (J). *Journal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2005. 43(4). 28.
- (5) 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 *Лекции по психологии* (M).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ти т. Т. 2. Москва: Педагогика, 1984. 416.
- (6) 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 *Учение об эмоциях (учение Декарта и Спинозы о страстях)* (M).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ти т. Т. 6. Москва: Педагогика, 1984. 93.
- (7) F. Azouvi. Le rôle du corps chez Descartes (J).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978. No 1. 8.
- (8) 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 *Орудие и знак в развитии ребенка* (M).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ти т. Т. 6. Москва: Педагогика, 1984. 50.
- (9) Yuriy, V Karpov and H. Carl, Haywood. *Two Ways to Elaborate Vygotsky's Concept of Medi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struction* (M).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53.
- (10) 黄秀兰. 维果茨基怎样研究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 (A). 见: 龚浩然, 黄秀兰. 维果茨基科学心理学思想在中国 (C).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104.
- (11) Wertsch. *Voices of the mind: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mediated ac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1991. 27.
- (12) Bruner, J. Introduction (A). In Vygotsky, L. S. *Thought and Language*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2. 7.
- (13) 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52-88.
- (14) V. Davydov, L. A. Radzikhovskii. Vygotsky's theory and the activity-oriented approach in psychology (A). In: P. Lloyd, C. Fernyhough. *Lev Vygotsky Critical Assessment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26.

(责任编辑 孟建伟)

*本文受教育部“2007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出(2007)3020号)资助。

(收稿日期) 2007年12月8日

(作者简介) 原琦(1980-)女, 甘肃兰州人, 南开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宋斌(1981-)男, 山东沂源人, 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目前正于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四大)哲学系从事访问学习。

[①]本文中对于维果茨基文献的引用, 译文参考中译本, 有改动; 若无中译本, 系笔者自译。

[②] “бескомпромиссно-причинн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②), p.346), 此词出自亚罗舍夫斯基(М. Г. Ярошевский)对于维果茨基情绪理论的评述。

[③] 有关维果茨基理论的一元论特质及其与当代其他心理学流派的对比, 可参见(③), p. 140); (④), p.28)。

[④] 某些笛卡尔思想的现代研究者, 如F. Azouvi, 在对笛卡尔情绪理论的研究中, 已注意到笛卡尔对于人类情绪反应机制的变革性认识: “(一般认为)我们是因为对象的恐怖而害怕, 而(事实却是)正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已准备好了做出害怕的反应, 所以我们才发现对象是恐怖的。”(⑦), p.8)在这样的意义上, 由笛卡尔开创, 并由其后继者如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等所继续发展的情绪学说正是詹姆士·兰格理论的先驱。

[⑤] 在对维果茨基“中介”概念的研究过程中, “语言”作为人类行为的辅助工具的巨大作用已被有关论者所注意到: “正是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为解决问题、克服冲动性行为、事先计划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调控自身行为等方面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⑨), p. 53)

[⑥] 有关维果茨基对于语言在人类交往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参见(⑩), p. 104。

[⑦] 布鲁纳在《言语与思维》英译本一书的导言中曾这样概括维果茨基对符号中介作用的观点: “他认为我们在把握自然的过程中把握自身, 因为正是将外部行动内化才产生出思想, 尤其是将外部对话内化产生出强大的语言工具以承载流动的思想。”(⑫), p. 7)

[⑧] 受维果茨基启发, 与人类工具技术发展史相联系, Davydov与Radzikhovskii曾着重论述了信号刺激对于人类心理结构变革之作用, 参见(⑭). p. 126。



Copyright 2001 - 2009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 邮编: 100190

电话: (010)-57552555